



点滴在心

吴官正

我担任江西主要领导期间，经历过许多事；退休后，对一些琐事，断断续续地写了一点儿，都是真实情况的记录。至于有些事是否处理得妥当，都已过去了。

刚到江西工作时，有一天，一个亲戚找到我说：“有一个告状的，讲状子如能送到吴省长手上，问题解决了，给一汽车木材。”我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告状找有关部门，我不能收这个材料。你利用我为你谋利，我做不得，请你谅解。”自然是把他得罪了。

198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，有位副厅级领导到我办公室，告他单位一把手的状。我耐心听了半个小时，他还喋喋不休。我说：“请你告诉我，他有什么优点？你有什么缺点？你向他当面提了没有？”他不做声。我心想，来说是是非事，多为是非人，就说：“你回去吧，如有意见，你同他交换，你说的这些事，似乎不是原则问题。”他无趣地走了。

1989年12月，李村同张村因鱼塘问题发生矛盾，各自的乡领导都指责对方，说自己管的村有理。县里派的工作组从各方面

调查核实，很难拿出处理意见。我到这县考察，听说李村和张村纠纷没有处理，就说：“我给你们出个主意，一天就能解决问题。”县里的同志说：“那太好了，我们一定照办。”我说：“把两个乡的党委书记、乡长对调，你们看如何？”大家听了，都说“是个好主意”。当天下午，县委、县政府召开会议，作出对调的决定。干部群众大多数赞成，少数不做声。这两个乡的领导不知说什么好，只好服从，事态很快平息了。不久，县委召开乡镇领导会议，这两个乡的主要领导见面时，相互握手。其中一位说：“真没想到，县里来这一招，如果以后哪两个村再发生矛盾，我们也用这一招。”说完，大家哈哈大笑。

有一年，新余、宜春几个相邻村子械斗，放火烧房子，砍油茶树，炸排灌站，还打死了人，闹得越来越大。那天我会见外宾后，回到办公室，常务副省长蒋祝平和副省长张逢雨对我说：“省长，请你去一趟吧，我们没办法了。”我应了声“好”，随即坐车去宜春。路不好走，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半左

右才到。早晨五时左右，我把公安厅副厅长卓枫等同志找来了解情况，商量采取果断措施。七时半开会，市地和他们分管的县市主要领导都来了，我说：“双方几百人真枪真刀搞械斗，务必坚决制止，此次处理后，这个地方30年不应再发生械斗。具体措施：一立即拘留五个村的党支部书记，因为他们是策划组织者；二对涉嫌犯罪的13个人，公安部门立即拘留审查；三被打死的人，务必在上午9时前收尸，否则我坐在他旁边，你们的书记、市长来陪我；四收缴一切械斗工具。”这四条一讲，气氛就开始紧张。我接着说，你们地、市、县党政一把手，都表个态，一人只说一分钟，结果都表示赞成。这时有个同志插话，我火了，说：“你又不是一把手，没有要你说话。”气氛更加紧张了，在座的领导都很震惊，没想到我们下这样的决心。公安部门立即采取行动，大概上午十时，我到几个村走了走，群众理解支持，认为不这样不行。此事已过去20年了，最近我在新余听说，那以后一直很太平。

大概是90年代初的一天，有位同志突然来到我办公室，求我救救他孩子，说小孩在工厂受了批评，跑去当和尚，全家哭得昏天黑地。我派人找到这个寺院的住持，请他做小孩的工作。他很好，对小孩说：“我们出家人，总是慈悲为怀，家里的人都希望你回家，还是回去好。”小孩很固执，后经过住持几天的耐心劝导，才同意回去。此时，工厂又要执行纪律，我担心出现意想不到的后

果,给这个厂的领导打电话:“你执行厂规是对的,但考虑到这个特殊情况,盼你支持,先别给他处分,欢迎他回去。他才19岁,到一定时候再教育批评,向你求个情。”厂长很通情达理,这个家的哭声变成了笑声。我却笑不出来,很难受,不这样怎么办呢?挽救这家庭合情合理,但却要厂长不执行纪律,心里很矛盾。

1990年秋的某天,二姐带她的一个儿子到我家。吃饭时,提出要我帮助安排工作,我很不冷静,说:“我死了,你们不过日子?我办不到,别说了。”二姐没做声,饭再也吃不下去了。看到她这样,我很后悔,不办可以,就不能好好说吗?午饭后,她就走了,肯定很生我的气。此后,我没再见她一面。这件事,想起来就痛苦,当领导的有时也可怜,亲戚有难处,心里同情,但像他们这样困难的,甚至更困难的还有啊?我是公职人员,又是领导干部,哪能关亲顾友?我最看不惯的是有的领导干部,一有权就谋私,他自己家里的人,包括三亲六故、七姑八姨,除了猫和狗没安排工作,其余全安排了。后来,我发现了这么个人,下决心调整了他的主要领导职务。

大概是1991年,一天早晨,两个男青年到我家,一个说:“美国一个大学已同意我去上学,离职时单位要我交一万六千元。”我问:“有合同吗?”青年答道:“入厂时确有承诺,实在没办法,只好求助你。”我说:“要问问情况,你们先回去吧。”他们走

后,我给这个单位领导打电话,问可否酌情减免他的违约金,并说,去留学是好事,即使不回来,也成全他,只要他爱国就好。这个单位的领导很好,同意了。过了一会儿,我发现茶几上一串钥匙不见了,猜到是他们哪位不注意随手带走了,就要身边的同志去要了回来。当时,有的同志很生气,我说:“不要猜测了,上班去吧!”

1993年的一天,有人到省政府上访,接访的同志很不耐烦,态度不好。我知道后,严厉批评说:“务必善待上访人员,如果上访的是你父母兄弟姐妹,你会是什么态度?”这个同志很虚心地接受了批评。我在江西当省长,群众写给我的信有6.9万多件,我批阅的有4700多件。不少人写信给我,反映考上了大学缴不起学费。我对因家贫而不能继续学业有切肤之感,对这类来信总是设法帮助。1994年12月,我同时收到南京大学一位学生和她的辅导员给我的信,反映这位学生父亲早逝,家中6口人全靠她母亲负担支撑,家中几乎断粮,就是转粮油关系的550斤谷子,也是到处借凑来的,对能否完成4年学业感到渺茫。我当即给这两位同志回信,让她安心学习,家里的困难当地政府已作了安排,也请学校给予帮助。我还请省政府办公厅给这位学生转寄去一些钱,以解燃眉之急。

当省长那十年,家庭生活并不富裕,住的房子也很破旧。爱人扫地、买菜、倒垃圾,几乎天天做。有一次,一个从广州来的同志看到

她倒垃圾,问:“这是吴省长家吗?”爱人回答“是”。他说:“你是他家保姆吧?我有事找省长。”她说:“进来吧。”我从楼上下来,爱人对我说:“有人找你。”我不认识此人,他说是某某的大儿子,他爸向我问候,并提出要我办事。我说:“办事要按程序,我从不干涉不该我管的事,请你谅解。”他还算好,没有纠缠,说自己去找有关部门试试,接着说:“你家这个保姆话不多,很有礼貌。”我知道他是说我爱人,“啊”了一声,不知说什么好。

几年后,我回到久别的家乡。想到在我身边工作过的同志,不容易,就在家请了两桌饭,喝点儿酒。这些同志都是好样的,我不会忘记他们,但也不能不顾原则关照他们。说心里话,有时在感情和原则之间很矛盾,但也只能从原则出发。

我有时很想念大姐和妹妹。她们实在可怜,没念过一天书,没过过好日子,一直在困苦生活中煎熬。我能为她们做的,只是每年春节前寄些钱去,以表心意。大姐80岁了,风烛残年。妹妹也年近古稀,天天伴着瘫在床上的丈夫,苦熬日子。她们是千百万中国农村妇女的缩影,所幸她们的后代日子过得去。这十多年来,她们的子女没找我提过要求,可能认为提了也不会办,还要挨训,不合算。她们也许心里对我有意见,但从未听到她们骂我。其实就是骂几句,我也不会放在心上。要当好一个党员领导干部,应该而且只能这么做。❶